

容闳曾国藩与中国近代首次官派留学生计划

宋镜明 宋 俭

本文拟对中国近代首次官派留学生计划的来龙去脉及容闳和曾国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作一评注。

一

选派幼童到美国留学的计划，是容闳于同治七年（1868）正式提出来的，而这一想法则由来已久。他早在耶鲁大学留学期间，其教育计划便已开始萌发。“以至 1872 年中国有第一批留学生之派遣，则此志愿之成熟时也。”^① 因此，当容闳 1854 年 6 月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便毅然决定回国实施他的教育计划。

然而，回国后的容闳却报国无门，那羊皮纸的文凭无法帮助他跻进官场。直到遇见曾国藩后，事情才开始有了转机。

同治二年（1863）初，当容闳在九江经商时，意外地接到一封安庆来信，寄信人张斯桂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僚，与容闳曾在上海相识。信中说，曾国藩闻容闳名声，亟思一见，邀他至安庆一行。容闳接信后，因不知原委，又顾虑到不久前曾到太平天国境内考察过，并与洪仁玕有过一段交情，恐中圈套，回信婉拒了。但两个月后，张斯桂又附了李善兰的来信相邀。李善兰说曾国藩有一极重要事要委容闳专任，望以尽快前去。容闳这才复信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以下未注明引文处，均引自此书。

应承前往。不久，张、李又再次来信促行，并透露曾国藩希望容闳能弃商从政，在其手下任职。这正是容闳所期望的。他知道，要想实施教育计划，凭自己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必先跻入政界，并得到朝中大员的支持。后来，容闳在自传中写道：“予初不意得此机缘，有文正其人为余助力，予之教育计划当不患无实行之时。若再因循不往，必致坐失事机。”

同治二年九月，容闳在安庆曾国藩的大营里初次拜会了曾国藩。曾国藩对新事情的敏感和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关注令容闳信心陡增。他把实施教育计划的希望，寄托到了这位当时位高权重，“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的封疆大员身上。当曾国藩第二次接见他，问：“若以为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手？”容闳由于事先从李善兰处得知，曾国藩正在积极筹备建立一西式机器厂，“议已成熟”，便投其所好，回答说应先建立生产机器之机器制造厂。这次谈话使容闳甚得曾国藩的欣赏。其实曾国藩早就有了安排，还在1861年设安庆内军械所时就计划“派员出洋购买造器之器”。容闳是他最属意的人选，他令张斯桂、李善兰连番促容闳速来安庆便是为了此事。一个星期后，容闳被任命为出洋委员，并授五品军功（虚衔），受命携银六万八千两赴美国购买机器。容闳不辱使命，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美国订购的一百多台机器全部运抵上海。这批机器奠定了中国第一个规模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的基础，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直接引进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这次洋务活动的成功，令曾国藩对容闳“极为嘉许”，并专摺为其请奖。由于曾国藩的大力保荐，容闳被清政府授为五品候补同知，“指省江苏，尽先补用”^①，并以此资格出任江苏布政司衙门译员。

同治七年，曾国藩由北方剿捻回任两江总督后，到辖下各地

^① 江世荣编注《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4页。

军营检阅，专门至上海参观了江南机器制造局。容闳在陪同他参观时，乘其兴致正高时提出，应在江南机器制造局附设一所机械学校，教授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践。这样，将来中国就不需用外国机械和外国工程师了。曾国藩听后大为赞许。不久，这所机械学校就开办起来了。这次尝试的成功，令容闳大为兴奋，认为这是其教育计划“小试其锋”。在经历十几年的等待后，容闳觉得开始接近目标了，他跃跃欲试，要把其教育计划推向实践了。

二

容闳踏入政界后，结识了洋务派的又一重要官员丁日昌。丁原亦为曾国藩幕僚，当时任苏松太道，深得曾国藩、李鸿章信任。容闳常出入他府中，两人很快成了知交。同治七年，丁日昌升为江苏巡抚。容闳即专程由上海到苏州丁宅拜谒，当面向他全盘托出了自己的教育计划。

丁日昌听了容闳的计划后，非常重视，当即要容闳尽快写一详细方案，交由他转呈位居中枢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容闳赶回上海后，即请人代笔，将自己的计划撰为条陈四则，其核心内容是第二款，即容闳的教育计划：“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在条陈中，容闳详细陈述了自己的计划：“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

这个条陈很快便由丁日昌转呈军机大臣文祥，由他奏报朝廷。然而，文祥因母亲突然病逝，回乡居丧，不及三月，自己也

去世了。容闳得此消息后，无异挨了当头一棒，他在自传中记下了这种沮丧的心情：“予目的怀之十年，不得一试，才见萌蘖，遽遇严霜，亦安能无怏怏哉！失望久之，烬馀复热。自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〇年，此三年中，无日不悬悬然不得要领。”他没有死心，每遇丁日昌，必与之讨论此计划，并恳求他常向曾国藩提起此计划，以得其援手。

机会终于来了。同治九年五月，天津发生教案，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至天津查办。不久，清政府又调江苏巡抚丁日昌至天津协办。丁即电召容闳为译员同赴天津。容闳决心乘此机会，说服曾国藩等支持他的教育计划。事情的进展出乎意料地顺利。三年前，曾国藩就由丁日昌处了解到容闳的计划，“已略知此中梗概”，此时，丁重提此事，他当即表示将全力促成其事。同治九年九月十六日，他给西太后和同治帝上奏，正式提出“博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并荐举容闳和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主持其事。为了说服西太后，曾国藩在草拟奏折时颇费了一番心机。他是以“调陈兰彬江南差遣”的名义上奏的，先是提出要调陈兰彬到江南操练轮船，然后又讲了彼得大帝学艺的故事：“如俄罗斯初无轮船，国主易服微行，亲入邻国船厂，学得其法。乾隆间，其世子又至英国书院肄业数年，今则俄人巨炮大船，不亚于英法各国，此其明效。”接着，便提出了派聪颖子弟到西方学习的建议，并解释说，此举将“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①。从这份奏折中，可以窥见当时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当初在京师办同文馆，在上海办广方言馆，请洋人作教习，尚且遭到顽固派官僚的极力反对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如今要派幼童出国留学更是惊世骇俗的事，势必引起朝野震动，阻力更大，若没有充足的理由

^① 《曾国藩全集·奏稿》第7133—7134页。

是难以说动西太后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丁日昌也曾对容闳说过：“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这也正是曾国藩在3年前便已了解到容闳的计划而一直无所动作的原因。曾国藩在另一份奏稿中谈到：“近年来设局制造，开馆教习，凡西人擅长之技，中国颇知容心，所需经费，均蒙谕旨准拨。”^①而1868年《蒲安臣条约》订立后，美国等国也欢迎中国派遣留学生。选择这个时机上奏比较有利。这样，随着曾国藩的有力介入，容闳搁置了十余年的教育计划终于被正式推了出来。

为了尽快促成留学计划的实行，病中的曾国藩进行了积极的活动，他首先争取了另一位洋务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全力支持。1870年底至1871年夏，曾国藩与李鸿章频繁函牍往返，商议留学计划的诸多具体事宜。因朝中久无回音，李鸿章建议“先须议订条款，预备经费”，并主动表示：“若有眉目，请尊处挈敝衔会奏。”^②这样，曾国藩便争取到了一个最有力的臂助。同时，曾国藩又驰召容闳来江宁商议实施留学计划的具体细节。据容闳回忆：“所商定者凡四事：曰派送学生之数额；曰设立预备学校；曰筹定此项留学经费；曰酌定出洋留学年限。”在商定了有关事宜并草拟出章程后，曾国藩派容闳先回上海筹备设立一预备学校，准备招第一批留学生。随后，曾国藩又派了一位亲信幕僚刘翰清到上海协助容闳主持其事。

在积极进行组织筹备工作的同时，1871年初，曾国藩又在给朝廷的一份奏折中促请尽快落实留学计划。同年8月19日（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曾国藩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并呈《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曾国藩在折中阐

① 《洋务运动》（二），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155页。

② 《洋务运动》（二），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173页。

述了选派幼童出国留学的必要性，他说，仅仅依靠大量购买外国机器、引进设备来发展本国军事工业，不唯使财源枯竭的国家财政难于承受，而且不能真正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密，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只有派人到西方去实地“肄习技艺”、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才能真正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收远大之效，“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习，然后可以渐图自强。”他再次呼吁：“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接着，他提出了派遣留学生的具体计划和步骤：一、通过美国公使与美国政府联系中国幼童赴美留学有关事宜；二、在上海设局经理挑选幼童、送派出洋等事，分别到上海、宁波、福建等处挑选 13 至 20 岁聪颖幼童，（按：容闳原主张选 12—14 岁幼童，曾国藩与李鸿章商议时，李强调应选 20 岁左右“通晓中国文义者”，故折中为 13 至 20 岁，后总理衙门复议时又改为 13 至 16 岁。）携至上海公局考试选取；三、选送幼童将分期进行，每年 30 名，4 年共 120 名，分批赴洋肄业，留学 15 年后，分批回国，根据所学专长，听候派用，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也不准私自先回；四、赴洋学习幼童，入学之初，所习何书，所肄何业，应由驻洋委员列册登注，四月考验一次，年终注明等第，详载细册，齐送上海道转报；五、在美国设置留学管理机构，派正副委员 2 人，翻译 1 人，汉文教习 2 人；六、经费预算。各种开支每年需银 6 万两，以前后 20 年计共需 120 万两，请饬准由江海关关税项下“按年指拨”，“勿使缺乏”^① 等等。这份奏折和《章程》遂成为这次派遣留学的纲领，后来整个派遣行动基本上是照此逐步进行的。

1871 年夏，在容闳等的主持下，挑选幼童的工作在上海开

^① 《洋务运动》（二），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 153—157 页。

始运转。当时，由于长期封关锁国，国人对西方了解甚少，都不愿子弟出洋，报名者甚少。为此，容闳又专程南下香港，在英国人办的学校挑选华人幼童，凑足了30名之数，其中广东人24名，江苏3名，山东、安徽、福建各1名，全是寒门子弟。这批幼童在上海集中后，开始补习英语，作出国前的准备。

1872年2月27日（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曾国藩再次领街上奏，促请派遣留学生计划的具体落实，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刊给“奏派选带幼童出洋肄业事宜关防”，荐举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常川驻扎美国，经理一切事务”。在上海设幼童出洋肄业局，刊给“总理幼童出洋肄业沪局事宜关防”，荐举“熟悉洋务”的刘翰清“总理沪局事宜”。头批出洋后，即挑选次年之第二批，又挑选第三、第四年各批，“与出洋之员呼吸相通”。“所有驻洋及在沪两局中外大小事件，由陈兰彬等互相商办，各专责成。”^①同时再次促请落实留学计划所需之经费。

谁也没想到，这次上奏竟成了曾国藩最后的“绝唱”，15天后，他因发脚麻舌蹇之症，死于江宁两江总督衙门，这对留学计划的进行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所幸此时留学生派遣计划已经按部就班地走上了轨道。1872年8月，中国第一批30名官费留学生在陈兰彬的率领下，由上海登轮出洋，驶向美国。

然而，始于1872年的这次留学行动并没有善始善终。曾国藩的继任者李鸿章的支持显然远不及乃师坚定。1881年6月，李鸿章放弃了对容闳的支持，清政府下令从美国撤回全部留学生，此时，尚未进行到预定计划的一半时间，而全部幼童中仅有2人大学毕业，还有约60人正在大学就读，其余的还只是中学生，却不得不黯然归国。第一次官派留学生计划便这样流产了。

^① 《洋务运动》（二），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157—158页。

三

由容闳、曾国藩等人倡导、发动并促成的中国近代官派留学生计划虽然半途夭折，但是其影响是深远的。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全局来考察，这次行动的意义主要不在于其结局如何，而在于行动本身。这次留学行动把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前期的“师夷智”还完全是一种被迫和无奈的话，这次留学行动则开始有了自觉和主动的色彩。此前中国与西方的接触仅仅只是被动地“引进来”，而这次留学行动则是主动“走出去”，这是近代中国人第一次在政府的组织下较大规模地主动走出国门，直接到西方实地求学取经。这次行动不仅成为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留学欧美日本潮的前驱先路，对于促进西学东渐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同时，这次留学行动也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詹天佑便是其中的代表。

如前述，此次留学生派遣计划的酝酿、提出、讨论和实施过程，无疑，容闳是这一计划的策划者和倡导者，也是这一计划的具体执行人之一。然而，我们认为，促成幼童赴美留学派遣计划的关键人物并非容闳，而是曾国藩，其理由如下：

第一，没有曾国藩的帮助，容闳只能空怀报国之心。容闳在自传中谈到：“我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从 1854 年回国至 1863 年九年的时间里，容闳一筹莫展，一事无成，自感“奢愿难偿”。正是在安庆结识曾国藩后，（顺带说一下，不是容闳主动找曾国藩，而是曾三番四次才请到容闳。）容闳才感到有了希望。他把希望就寄托在这位“清代第一流人物，亦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身上。他在自传中多次谈到：“有文正其人为余助力，予之教育计划当不患无实行之

时”。“因曾而予之教育计划乃得告成”。可见，容闳本人也将曾国藩视为实现留学生派遣计划的关键人物。事实上，也正由于曾国藩的赏识和大力推荐，容闳才得以以“无功名”而跻入政界，这是他日后提出留学计划的前提条件。后来，试图通过军机大臣文祥来推行此计划，结果空欢喜一场。直到曾国藩亲自介入后，事情才有了转机。由此可见，容闳纵即使是留学生派遣计划的“原始发动者”，但他却无力实现这一计划。影响历史发展的是计划的实行而不是计划本身，再好的计划，只有将之付诸于实践，才能影响历史，才能成为不朽。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认为实现留学生派遣计划的关键人物是曾国藩而非容闳。

第二，曾国藩是实施留学生派遣计划的主动促成者。在留学生派遣计划的实现过程中，曾国藩是一位积极、主动的促成者，当丁日昌向他详细介绍了容闳的计划后，他极为赞许，立即以极大的热情来促成此事。他的这种态度与其洋务思想有关。曾国藩认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功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①当时，他对予造炮制船的认识较之一般洋务派官僚要高于一筹，他不满足于简单的购买和仿造，而认识到“洋人制器，出于算学”^②，“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为表里”^③。故主张要学习和了解西方的基础科学知识，并一直注意收罗了解西方技术和情况，进而主张有意识地培养和造就这方面的人才。他在安庆时就收罗了一批了解西学的科技人才，“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容闳也是那时为他收罗的。后来，他又在江南机器制造局附设机械

①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

②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95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卷首，奏议（八），第4855—4856页。

学校和译书局，都是为了培养了解和掌握西方先进科学知识与技术的人才。他让自己的儿子也学习英文和西洋算学。容闳的计划正与他不谋而合。因此，尽管当时处境困难，他仍极力促成此事。从1870年9月至1872年2月，也是他生命的最后17个月里，他先后4次给清廷上书，来推动计划的进行。他还争取了李鸿章的支持，从当时他与李鸿章的往返信函中看到，他们讨论了派遣计划的每一个具体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有了曾李的合作和二人的联衔合奏，事情也就成功了一大半。他又将容闳召至江宁，在病中亲自与之讨论了计划的细节和章程草案，在给朝廷的奏折里，他殚精竭虑，博证旁引，来说服西太后等。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积极活动，才最终促成了留学生派遣计划的实现。

第三，曾国藩是实施留学生派遣计划的实际领导者。参与这次留学生派遣计划的主要人员有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陈兰彬、容闳、刘翰清等人，曾国藩无疑是他们的领袖。整个留学生派遣计划的实施是在曾国藩的具体领导下进行的，历次上奏，均由其领衔，陈兰彬、容闳及刘翰清的职守均由其保举，派遣留学生的条例和章程也是在他的领导下制订的，派遣留学生的两个管理机构出洋局和沪局的设置及关防亦是由他“刊刻飭发”，并接受他的领导，而陈、容、刘诸人也奉他为领袖。容闳在回忆中亦称曾为“创业之人”，认为第一批留学生出洋是曾“手植桃李”，“手创事业之收获”，认为“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今日莘莘学子，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是文正之遗泽，勿忘所自来矣”。

（本文作者：宋锐明，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